

文章编号:2095-0365(2021)01-0058-04

# 纪昀小说中的诗歌用语及其叙事功能

吴 卉

(石家庄铁道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诗歌是纪昀小说叙事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主要包括:一是引录景物诗、即事诗,如诗坛佳话、友人唱和、纪昀本人的西行杂诗等;二是借用前代或当时的诗人创作,包括大量谏语诗。诗歌用语在小说中承担了三方面的叙事功能,其一为纪实,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二是借诗歌议论,说明义理,表达见解,帮助推进叙事进程;其三是借小说品评诗歌的优劣,表达自己的诗歌理论。诗歌作为纪昀小说叙事话语的重要内容,是小说文本理性书写特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对子部小说创作精神的延续。

**关键词:**纪昀小说;诗歌;叙事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1.01.10

诗歌叙事话语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占颇多。纪氏以诗传家,纪昀高祖纪坤有诗集《花王阁》,其伯祖纪灵也是著名诗人。纪昀在12岁时,随父亲纪容舒定居京城即开始学诗,乾隆十三年,还与钱大昕、卢文弨等人结成文社,唱和往来。今人所辑《纪晓岚文集》中,收诗十六卷,蔚为大观。纪昀爱写诗善写诗,然其更热衷于品评,曾自述“余少时阅书,好评点,每岁恒得数十册”<sup>[1]</sup>,这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体现明显。

就传统而言,诗歌成为小说叙事话语的组成部分自唐而始,然而,小说的诗歌用语又不同于诗性小说<sup>[2]</sup>。小说的诗性或曰诗性小说,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小说与诗的内在肌理的融合,当“诗歌的抒情性和创造意境的特征,影响并渗透到小说的情节,特别是人物塑造中去的时候,作为叙事文体的小说,就同时具有了抒情文体诗歌的某些特征”<sup>[3]</sup>,由此产生的“诗意化小说”更容易给读者带来审美上的享受。这一审美特质,并非仅靠诗歌在小说中的参与就能达到,这一点已有研究者指明<sup>[4]</sup>。诗歌的使用,能否体现出作家或者故事人物的生命情感,是小说是否具有诗性特征的判断标准。小说之诗

性,应当侧重于营造张力型的审美情境,表现无限的情意诉求,是“通过自然景物、通过心理感受而形成的一种统一的情调和气氛”<sup>[5]</sup>。然而,文人小说极力追求的这些诗意想象,却是纪昀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极力避免的,即使是在《阅微草堂笔记》的大量诗歌篇目中,我们也极难发现作者情绪、思想的波动。据笔者统计,小说中与诗赋相关的作品共139则,以穿插引用或全文议论的方式共涉及诗赋200余首。这些诗歌在作品中的叙事功能大致有3种,总体上均以纪实、议论说理和批评为旨归。

## 一、引录纪实,史料完备

纪昀小说引录景物诗、即事诗以纪实,如诗坛佳话、友人唱和、西行杂诗等,通常占据完整一篇的篇幅。这一类参与叙事的诗歌作品,由于不作为情节单元存在,不具备推进叙事发展的功能,散文部分,往往有如诗传,用以介绍诗歌来历。《滦阳消夏录》(一)第4则记东光李又聃,曾到宛平相国废园中,遇见廊下有诗二首。其一曰:“飒飒西风吹破棖,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

收稿日期:2020-05-26

基金项目:2020年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清代笔记小说叙录及其研究”(SD201083)

作者简介:吴卉(1986-),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明清小说。

本文信息:吴卉.纪昀小说中的诗歌用语及其叙事功能[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1):58-61.

时有片云行。凭栏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sup>[6]</sup>全篇一百三十字,诗歌占其一半,作者纯为记录友人的诗文。又如《槐西杂志》(一)第2则,纪昀主会试所取之门生王金英喜作菊花诗,作者尝与其唱和,记录其绝句五首。《滦阳续录》(二),作者详细记录与顾晴沙、朱石君等人互相唱作,纪昀题晴沙画:“深浇春水细培沙,养出人间富贵花,好似艳阳三四月,余香风送到邻家。”边秋崖和曰:“一番好雨净尘沙,春色全归上苑花,此是沉香亭畔种,莫教移野人家。”又题朱石君诗两诗,张镜壑和诗一首,然而对这些看似放浪形骸,互以虚诞为笑乐的诗作,纪昀师蒋文恪是有所劝讽的:“诸君子跌宕风流,自是佳话,然古人嫌隙,多起于俳谐,不如并此无之,更全交之道耳。”纪昀认为这番话“老成之所见远矣。录之以志少年绮语之过,后来英俊慎勿效焉。”<sup>[6]</sup>又如《滦阳续录》(四)中记录纪昀座师介野园的宴诗,以荣其名。此类篇目以记录文人题咏或生活为主,诗歌与小说文体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是历来文人笔记的传统内容之一。如《程史》卷五“大小寒”“赵良嗣随军诗”<sup>[7]</sup>,即为此类。

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纪昀因漏言获谴,谪戍新疆,在此期间,作《乌鲁木齐杂诗》160首,内容丰富,包含了乌鲁木齐的当地风光、人情物理以及兵农生产诸方面,堪称一副细致的边陲风俗画。这些诗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极高,《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中,作者常直接搬引自己所作诗歌,回忆西域时光。纪昀在诗中叙次风土人物,表现学识博赡,而将这些诗放在小说中,小说内容则有了“注诗”之用。

《滦阳消夏录》(三)有一则记录了作者在昌吉筑城时,掘土五尺余,挖得一只红繡丝绣花女鞋,制作精致,尚未全朽。诗曰:“筑城掘土土深深,邪许相呼万杵音。怪事一声齐注目,半钩新月绉花侵。”<sup>[6]</sup>诗即咏此事。对这一奇怪的现象,纪昀心中存有疑惑,他认为鞋入土至五尺余,最少也要数十年,何以不坏?而当地额鲁特女子没有缠足的习俗,鞋样又为何仅三寸许、是弓弯状,这其中必有人不可知的缘故。诗的来历以及对所咏之事的看法,都在短短三百字内交代清楚。同卷中另一故事,则介绍了乌鲁木齐深山里一种类人形体态矮小的哺乳动物,因其喜戴红柳,纪昀称之为“红柳娃”<sup>[6]</sup>。

志怪之余,纪昀也常以诗歌记乌鲁木齐的风土或典制。《如是我闻》(二)中一则纪昀录其杂诗两首,其一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

金井银床无处用,随心引取到花畦。”其二曰“山围草木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处,绿氍毹上看棋枰。”<sup>[6]</sup>单从诗歌字面看,读者并不能完全体会作者所要传达的内容,配合小说叙述详尽的语言才可一窥究竟。伊犁城中无井,军民用水均需汲水于河。有一佐领认为戈壁草木不生是因为积沙无水,但既然伊犁城中多老树,则其下必有水源。于是就在树根下凿井,果皆得泉。作者因此感叹此佐领是格物之才。后来纪昀于乌鲁木齐筑城时,就借用此法,卜地通津,并作诗纪凿井之事。

纪昀在小说中大量使用纪事诗,并不是为了描写山水清音,而是为了保存历史。在诗歌中,读者了解到了和纪昀相关的许多人的作品、他们交往的细节,也了解到了新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补充了时人对乌鲁木齐认识的不足,其史料及文化价值远甚于审美价值。

## 二、议论说理,理性克制

纪昀常在小说中借诗歌议论,说明义理,表达见解,有的直接借用前人或时人创作,有的则为讖语诗,多述历史国事。纪昀好议论,《如是我闻》(二)中有故事记一客携柴窑片磁来访,客云此磁能做辟火器使用,纪昀为了验证真假,提议用绳子悬挂磁片,以铤发铅丸击之,根据是否击碎判断其说。鬻者不肯,怀揣而去,后来成功卖于另一贵家,得到百金。纪昀听说之后,想起了自己曾作瓦砚歌云:“铜省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多如斯。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sup>[6]</sup>诗中所言正好用来影射随后被骗的贵家子弟。

作为子部小说的理论家及创作者,纪昀一方面在《四库全书》编纂中确立了子部小说的体例特征,另一方面将之融入具体的小说创作中,强调了子部小说以“诉诸理性”为主的追求,并形成了《阅微草堂笔记》的理性书写方式。诗歌作为小说叙事话语的一部分,主要的功能是论理,大量的诗歌用语既不构成作者感知世界或表达自我的方式,也不是故事中人物展示情感意志的手段,纪昀理性而节制地面对世界,不以创造诗的意境为目的。与此同时,纪昀以著书者身份严守小说体例,在创作中始终注意展现自己的学者身份以及鲜明的创作观念,在各类故事中不断解释个人创作的理性追求,借此强化小说文本的理性特征。《姑妄听之》(一)中一篇,开首即题宋人咏蟹诗曰:“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谓之寓朱勔之贪婪必败。各类庖厨之物

中,烹调螃蟹比其他事物更显残忍,必须经历生投釜甑,徐受蒸煮,由初沸至熟,由黑变红的过程。由此作者提到赵宏燮官直隶巡抚时的一件事,赵梦家中已死僮仆媼婢数十人,环跪阶下叩额乞命,其缘由则是因生前互结朋党蒙蔽主人,导致死后惩罚,堕入水族,世世罹汤镬之苦。恰巧第二日,赵家供膳蟹,即梦中所云奴辈后身,赵公选肥美时蟹投水,作礼忏功德。这一行为引起家中奴仆窃笑,他们假托放生却私享供膳,又偷藏功德钱,假装完成佛事。赵公竟毫不知情。纪昀对奴辈的作为大加鞭挞,认为他们“留此锢习,适以自戕。请君入瓮,此之谓欤。”<sup>[6]</sup>细读此篇,读者会发现作者引用的诗歌只是作为自己议论的引子而已,其后的叙述与前引诗文并不构成逻辑联系。

其他偈诗、讖语诗、扶乩诗,在小说中更是俯拾即是。在这些篇目中,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并非作者强调的部分,写作的重点在于所选诗文能否“有用”,也即能否服务于叙事。如“削发辞家净六尘,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爱物无穷事,原有周公孔圣人。”<sup>[6]</sup>言佛法近墨。“鷓鴣惊秋不住啼,章台回首柳萋萋。花开有约肠空断,云散无踪梦亦迷。小立偷弹金屈戌,半酣笑劝玉东西。琵琶还似当年否,为问浔阳估客妻。”<sup>[6]</sup>言鬼亦当敬。“草草莺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sup>[6]</sup>此诗为纪昀侄生前梦所得,其早逝后,作者认为这是其妻孀独宿之兆。这些篇目中,诗歌作为所叙之事的预兆,其内容帮助推进叙事进程,用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突发状况或不易被人理解接受的事情。

### 三、与鬼论诗,品评优劣

纪昀还经常现身小说中与鬼狐论诗,或为戏谑,或直接论诗,品评诗歌的优劣。纪昀写诗,同时也有关于诗歌评价的完整理论,因此,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他时常对诗歌进行品评。这类作品,更似宋人的论诗笔记。《槐西杂志》(四)记周书昌亲历之事,山中民舍,处老树森翳之中,夜里常有鬼语讲论韩、柳、欧、苏,各标举其佳处。同卷又有张桂岩所携琴硯上之诗,如“如以文章论,公原胜谢刘。玉堂挥翰手,对此忆风流。”针对此诗落款之名,纪昀又举渔洋论诗绝句曰:“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红似去年时。江南肠断何人会,只有崔郎七字诗。”<sup>[6]</sup>以证其人。

纪昀笔下的鬼题诗类小说颇多,然而故事情节、线索并不清晰,鬼怪本身形象匆匆而过,对

他们的经历只字不提。“花妖狐魅”口中的诗歌,大多都是表达纪昀的生活经历、治学态度的媒介,展现出他不同于下层文人的思维方式。他在写作中并不通过所用诗歌作个人情绪的宣泄,不刻意渲染怪异,不利用幻想出的“圆满”给现实人生提供寄居之所,在“实录”原则中始终保持理性态度、提出合理怀疑、提供解决方案。这既是纪昀小说观的实践,也是对子部小说创作精神的延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蒲松龄笔下的诗性故事。在鬼狐题材中用诗歌塑造人物形象,增强小说的审美意蕴和情感冲击力,是《聊斋志异》的特色之一。如最为读者熟知的《公孙九娘》<sup>[8]</sup>,叙述了于七一案之后,莱阳生在祭奠亲人的路上偶遇冤鬼公孙九娘,二人短暂为婚,却始终阴阳两隔,未成眷属。公孙九娘是莱阳生同邑朱生之甥女婢,亦从栖霞事中逃离,其母因为不堪贫困而死,九娘随之自刭。二人合欢之夜,公孙九娘追述往事,哽咽成诗:“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这两首诗表达的内容十分符合公孙九娘的形象设定,她生前穿的衣裳早已腐烂,化作尘土,每每空自怨恨自己的悲惨遭遇,十年来置身于寒露冷月、枫林萧瑟的秋野,直到遇到莱阳生才初次享受闺阁中的人间春意。如果说小说和诗文已经融为一体,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和悲伤情绪,那么“异史氏曰”则使这种感情更为激荡:“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诗歌浓缩了主人公的一生,表达的是公孙九娘的肺腑之情,因为这两首诗,小说文本更能牵动读者的阅读感受。

这就和《阅微草堂笔记》形成区别。《滦阳消夏录》(一)第6则,记录了王执信随父宦途中在一野寺经阁下听鬼论诗之事,此则用“其一曰”“其二曰”“其一又曰”<sup>[6]</sup>贯穿全文,是典型的诗论用语,诗和故事人物、听者乃至作者都毫无联系,因此并不具备任何情感上的动容力量。

至于《滦阳续录》(四)中以元稹、李商隐等诗为例,考证织女传说的细节真实,由诗及文,由文入史,则更是纪昀作为学者的一贯态度。太原申铁蟾,好以香奁艳体诗寓不遇之感,曾有一首无题诗曰:“垆粉围墙画楼,隔窗闻拨箜篌,分无信使通青鸟,枉遣游人驻紫骝,月姊定应随顾兔,星娥可止待牵牛,垂杨疏处雕栊近,只恨珠帘不上钩。”却被时人认为有诬蔑仙灵之意。就此,纪昀

举元稹诗和李商隐诗试图为之辩驳,他认为元稹意在双文,义山意在令狐。而文士习惯于掉弄笔墨,借为比喻,初与织女无涉,申氏此语,并不算诬蔑仙灵。从这首诗出发,纪昀又谈到了史家著录及小说创作的真实性问题。所谓“纯构虚词,宛如实事,指其时地,撰以姓名……则悖妄之甚矣。夫词人引用,渔猎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实,然过于诬罔,亦不可不知。盖自《庄》《列》寓言,借以抒意,战国诸子,杂说弥多,讖纬稗官,递相祖述,遂有肆无忌惮之时……学者当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遽执为谈柄也。”<sup>[6]</sup>此则故事,以诗论开始,遍及子史,内容丰富详赡,与他批评诗歌时“要言不烦”<sup>[9]</sup>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以上篇目帮助读者在理性批评中增长了见识,此种以理性的态度统摄诗文的写作方式,其来有自,在子部小说中常常出现。早期《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论赋”<sup>[10]</sup>

(卷二)、“郭威论《尔雅》”<sup>[10]</sup>(卷三),或明代《菽园杂记》卷二,作者对《饮中八仙歌》《郊居诗》《枫桥夜泊》等诗歌用字的品评<sup>[11]</sup>,均可作为证。诗歌这一文体样式虽直接出现在小说中,但其潜层次并不体现出作者对诗性的追求,他也并不号召读者在审美层面感悟诗歌语言,反而强调对诗歌的理性认识,小说成为品评诗歌的媒介,是跻身子部小说作家的纪昀理性写作态度的证明。

纪昀的博学与理智,一方面造就了《阅微草堂笔记》故事世界的客观与公正,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其他遵循“著书者之笔”创作方式的志怪小说作者的影响,折射出当时精英士大夫阶层普遍的伦理观。小说中大量使用的诗歌,其频率虽远高于清代其他志怪小说,然广泛穿插诗词韵语的目的却并不在于表达个体的诗意审美追求,其学术化的书写特征,值得研究者的重视与探讨。

## 参考文献:

- [1]纪昀.瀛奎律髓刊误·跋[M].嘉庆五年刊本.
- [2]吴波.论《阅微草堂笔记》的诗性特征[J].求索,2011(7):200-202.
- [3]周先慎.形式的结合与内质的融合——论中国古典诗歌对小说文体与艺术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2013(4):68-76.
- [4]王昕.《聊斋志异》:诗性的温情与偏狭[J].文学评论,2016(1):216-224.
- [5]王瑶.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N].文艺报,1956(19-20).
- [6]纪昀.纪晓岚文集·二册·阅微草堂笔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2-3,6,47,51,63,166,181,189,357,402,520,544-545.
- [7][宋]岳珂.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62-63.
- [8][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77-484.
- [9]蒋寅.纪昀的批评理念与诗歌批评成就[J].求是学刊,2015(6):98-107.
- [10][晋]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17-18.
- [11][明]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21.

## The Poetic Language and Narrative Function in Ji Yun's Novel

Wu Hui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Poe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i Yu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 his novels, and its forms mainly include: first, the introduction of scenery poems and topical poems, such as good stories from the poetry world, the singing of friends, Ji Yun's own miscellaneous poems in the west, etc.; The second is to borrow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r at that time poet creation,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prophetic poems. These forms of poetic language in the novel assume three narrative functions, one is documentary, has certain historical data value; The second is to use poetry to explain the theory, express the views and help to promote the narrative process. The third is to use novels to evaluat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poetry and to express one's own theory of poetry. Poet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rrative discourse in Ji Yun's novel, is on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ational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novel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reative spirit of novels.

**Key words:** Ji Yun's novel; poetry; the narrative function